

翻譯跨域：評陳碩文《航向新世界： 現代文人在上海的跨域譯寫》

梁右典 Yu-Tien Liang (黃岡師範學院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)

「自我」與「世界」的關聯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議題，切入角度因立場而異，如從「政治主體」出發，以「左翼文學」作為研究進路是過去常見的思考角度，「國」與「國」的文化認同問題，在此顯得更為凸出。回到當時背景來說，梁啟超（1873-1929）明白指出：「曾幾何時，（吾）為19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、所衝擊、所驅遣，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，浸假使將不得不為世界人焉」（梁啟超，1989：185）。從「國人」至「世界人」似乎彈指間事，轉換速度亦反映心態遽變。近現代國家意識的相互角力，呈現此段時期之轉型變化，亦不得不先從「翻譯」著手。不同國家於接觸互動之際，翻譯過程不僅僅是字詞句層面意涵，更涉及彼此的藝術形式與感覺結構如何被理解，因此「跨域語境」與「理論旅行」都是對於翻譯「本色」要能提出一定程度商榷，並非僅是工具性思維所能概括（薩依德，2009）。近來政大陳碩文教授《航向新世界：現代文人在上海的跨域譯寫》即是對此議題進行探索，以上海為考察中心，成為跨域譯寫「神聖」之地的上海，現代文人在此大放「譯」彩，但實際內容的系列闡述仍有待研究，本書正好填補該塊園地的空白。書中結構分成三編六章，包括「翻譯現代：國族想像與域外文藝傳釋」、「前鋒左翼：唯美派與異國新潮文藝譯介」、「亦是摩登：通俗文人文藝譯介與跨域實踐中的現代圖景」等等，要點說明如下：

第一章〈「瞭解全個世界：施鰲存與弱小民族文學譯介」〉，近年《施鰲存譯文全集》出版，施鰲存（1905-2003）譯文涉及題材廣泛，同時也反映譯者對於文化脈絡的看法，特別值得留意是「弱小民族」的概念生成與原因解釋，認為「我們的一呼一吸，都已與世界上任何一個隅角裡的人息息相通」（施鰲存，2003：19）。不但與當時所處情境呼應，亦有認識、走向世界的願望。第二章〈譯述藝術：傅雷與《藝術旬刊》中的現代文藝〉，探討「藝術」概念如何在中國催生成型，透過閱讀傅雷與《藝術旬刊》的文本，更有系統進行脈絡化閱讀，凸顯「國族文化想像和參與世界藝壇之理想實仍難以切割」（頁85）。第三章〈左翼與摩登之外：葉靈鳳《現代小說》中的文藝譯介與小說創作〉，所說如同施鰲存描寫下的世代：「我們是租界追求新、追求時髦的青年人」（張英鳴，2006：48）。且文中特別留意種種關係不斷「協商」（compromise）的結果（頁121），亦更加凸

顯「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階段性和複雜性」(頁127)。第四章〈唯美者的戰歌：朱維基、芳信二戰前後的異國詩歌翻譯〉，作者參酌情感史(the history of emotions) 的寫法，論述文藝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經歷什麼樣的轉變，於文學史發展脈絡又有什麼意義。翻譯過程不僅是意譯，也彰顯「唯美」性質，一方面作品反映現實處境，也達到美麗謊言的效果，透過翻譯文學的手法，適度模糊社會與詩作的距離，書中留意王爾德(Oscar Wilde, 1854-1900) 所謂「謊言，關於美麗不真實之物的敘述，是藝術自身之目的」(Lying, the telling of beautiful untrue things, is the proper aim of Art) 之語，頗有畫龍點睛之效，亦適用於此處脈絡討論。第五章〈紳士怪盜的跨文化行旅：孫了紅的「東方亞森羅蘋」魯平奇案〉，彰顯「偵探小說作為一種世界文學類型之跨界流動」(頁202)，某種程度上亦是批判當時法律制度，偵探形象相對於法律規範，用意在於訴諸法外正義的意涵。作者敏銳察覺到偵探小說的內涵與《二十年目睹怪現狀》的主角「九死一生」有許多類似之處，因而使得「紳士怪盜的跨文化行旅」在中文世界裡帶有更多「混雜性」(hybridity) 色彩(頁224)，這就表示偵探小說不僅僅是語言翻譯，而有更多相互對照的豐富視野值得留意。第六章〈演練現代性：陸澹齋偵探影戲小說的跨界譯寫〉，將影戲與小說綜合觀察，並從「衍生小說」(tie-ins) 眼光看待「通俗現代主義」(vernacular modernism) 現象，巧妙地將電影戲劇的敘事風格與中國流行小說連繫起來，帶有某種「親和性」(頁248)，值得加以論述(李歐梵著，毛尖譯，2000：99)。

綜觀全書章節，「翻譯」與「跨域」是其中關鍵詞彙，亦是核心概念。上海既是地理空間，也是往來流通的國際城市。此種翻譯跨域的論述出發基礎，是由上海文人在上世紀前半葉，就具有的文化雙重意涵：第一，上海如同普拉特(Mary Louise Pratt) 所說是成為「文化接觸地帶」(contact zone) 的區域(Mary Louise Pratt, 1991:33-40)，具有「媒合」與「轉譯」各種國際訊息的第一手報導，過去多留意報紙，較少關注小說翻譯情形。因此，當中反映的文化面貌包括當時最即時的訊息，透過作者考察不論是在數量與質量，上海文人都能在短期間中達到極高的翻譯水平。當中的翻譯現象值得留意，作者更凸顯翻譯文化帶來的種種省思。

過去學界未形成充分的「譯界研究」，如今則可再凸顯當中的「感覺結構」，也就是譯者如何表現他們對於世界的看法。換言之，如果將翻譯僅僅視為工具，此種思維意義過於狹隘，如今需要改變重新，帶入更為多元視野，方能彰顯譯者的主體意涵。透過文本翻譯，如此方能達到與其他文化的關係，正是處於一種動態的「交互性」。第二，翻譯也是一種「認同」概念的開展，特別對於施肇存的研究，論述他對「弱小民族」的概念，既反映當時譯者心態，亦涉及多種「認同」意義開展的可能性，包括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，也正是與上述所說「感覺結構」密切相關。一言以蔽之，透過

翻譯能夠明確察覺到對立概念的消弭，自我與他者、國內與國外、本土與世界之間找到端倪，以致於能夠相互呼應，同氣連枝的「世界人」理解模式。例如偵探小說與《二十年目睹怪現狀》的內容，在「以異為新」的視角下重新省思在翻譯過程中的交涉對話，作者梳理此中意涵是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。

「現代性」則是當中另一議題值得闡述。作者對於「現代性」的理解，透過上海文人翻譯的史料逐步開展，置於「跨文化現代性」(transcultural modernity)的範疇之中。因此，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並非此時譯界主調，但是過往的確較為忽略以譯者為主體的視角。所以，書中議題開展的重點似乎不是從翻譯須「信達雅」的「規範性」入手，而是更加關注譯者的「主體性」論述 (Hsiao-yen Peng, 2010)。上海文人對於「現代性」並沒有明確說法屬乎何種概念，留給研究者許多詮釋空間，如今更透過翻譯眼光的確能讓讀者看到「關係取代本質主義」的種種現象 (Erwin Koppen, 1984)，於是作者將「現代性」與「世界性」適度結合起來。書中透過數個翻譯案例作為說明，可以增加對此議題之認識，並認定譯者主體之現象不容忽視。此外，作者也留意歌德早在 18 世紀就提出對「世界文學」(Weltliteratur)的認識 (David Damrosch, 2003)，當時所提的內容大致聚焦於交流和閱讀模式 (a mode of circulation and of feeling)，作者留意學界要點接續而發，大抵上是將「世界文學」視為一種「概念」，認為「重視此一概念的流動性特質，無疑更有意義」(頁 21)，賦予「世界文學」有時代意義，當然也不可避免有國族想像的問題。

國族涉及政治議題，書中另條主軸應可從「左翼世界主義」(leftist cosmopolitanism)而發，另闢論述園地；主題設定較為接近者是關乎反抗壓迫、追求公平正義、以及對於弱小民族作品的譯介。但是，作者對此較少進行開展，似乎將此僅僅視為另外一種「聲音」表達。例如書中提到：「但吶喊以外，也有陰鬱、笑聲和情懷」(頁 276)，即可作如是觀。再如偵探小說的引入，以及通俗劇電影形式的方法採用，使得譯文也能達成一定程度的「親和性」——特別是置於「世界文學」與「電影戲劇」的討論框架確是如此。如此至少會再衍生兩條思考路線，需要加以說明：第一，翻譯小說與傳統文化的關聯為何，能夠與唐人傳奇、宋人筆記與明清小說產生什麼樣的關係。第二，翻譯小說透過電影敘述手法的推廣更為人知，鏡頭畫面與視聽語言都是當時新型產物，節奏感不同於文字韻律，因而造成一種廣義的「互文現象」。例如翻譯小說成為劇本，結合電影演出，搭配讀者閱讀，延展性與開拓性顯得更為蓬勃發展。書中引用古老的義大利俗諺「譯者，逆者也」(Traduttore, traditore)的思考 (頁 290)，強調回到譯者之心與作者之意，當中來回往復的過程，既是「心知其意」，也是譯者在「交互脈絡」中的不斷前進。如何調節當中論述是很重要的思考方向。因此，作者將翻譯視為「逆反」的意涵，既在此書研究中能夠得到

較好地理解，也是堅持「跨越、流動的視野，不斷叩問、敲擊所有的堅固壁壘，不斷尋求對話和理解」(頁290)。

而在此「跨越」與「流動」的視野中，作者也嘗試要建立一種翻譯研究的可能方法，積極關注譯者的情感與生活、理想與抱負等等背景，某種程度上可將翻譯工作作為一種文化認知的現象。借用並調節 Nussbaum 所說，以此(此指「翻譯」)視為一種以情感出發的認知功能(Nussbaum, 2013)，能夠標誌所在的世界面貌。因此，翻譯過程的意涵可再分為兩種，第一種是作為書中分析對象的譯者，第二種則是對此譯者「再解譯」的過程，例如本書作者所作的工作，基本上是強調上述所分的第二種意涵。以上兩種面對翻譯過程的想法不盡相同，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「主題性」(thematic)的聯結充滿興趣，例如「弱小的」、「唯美的」、「偵探的」等等，當中都具有充足開放性的內涵可供討論，某種意義上亦是從中進行「主題化」(thematize)的定位與闡釋。在此可以借用 Stalnaker 的「橋樑概念」作為理解上的幫助(Stalnaker, 2006)，以致於「同時為個別案例開放更好的具體化空間」(王華，2025:188)，並保持一種動態平衡開放的論述策略。

最後，本書對於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架構理解有何幫助，以及還有哪些未竟之業值得拓展，可以再就此進行論述。本書是從翻譯角度出發以構成文學史視野下的重要環節，最重要的信號即是「世界文學」進入譯者識田而逐步開展。這就不同於傳統的「格義」方式，而是更多地賦予翻譯工作一種「交互主體」的概念，或稱為是一個「平臺」的充分展演，即「介於兩者之間(in-between)的「地帶」——乃是接續 Thomas Moore 而發(Thomas Moore, 2000:34)，作者書中亦有提及(頁285)。一般來說，對翻譯的印象是強調信達雅，但在本書意涵的闡釋卻是允許模糊性(ambiguity)與流動性，正是因為翻譯工作即是一個有待發掘的文化現象，如何取得一定平衡論述，涉及跨文化思維與實踐則是接下來的挑戰。現代文人在上海的跨域譯寫在本書的重要性於是彰顯，扮演領頭羊的角色，更有待未來更多論述的可能性，結合思維方式的符號轉換、感覺結構的重新嵌入、以及文化特色的相互參照等等，如同本書所說「期能為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，開啟更豐富的詮釋空間」(封底語)。

參考文獻

- 王華。〈對跨文化哲學中「橋樑概念方法」的一些反思：以蔣韜「人道抑或正義」先秦思想詮釋架構為例〉。《文本·方法：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》，編者劉滄龍，政大出版社，2025，頁183–212。
- 李歐梵。《上海摩登——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–1945》。譯者毛尖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0。
- 施蛰存。《施蛰存序跋》。東南大學出版社，2003。
- 張芙鳴。〈執著的中間派——施蛰存訪談〉。《新文學史料》，2006 年。
- 梁啟超。《飲冰室合集》。北京中華書局，1989。
- 薩依德。《世界·文本·批評者》。譯者薛絢，臺北立緒文化公司，2009。
- Damrosch, David. *What Is World Literature?* Princeton UP, 2003.
- Koppen, Erwin. "Weltliteratur." *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*, edited by Klaus Kanzog and Achim Masser, de Gruyter, 1984.
- Peng, Hsiao-yen. *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: The Dandy, the Flâneur,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, Tokyo, and Paris*. Routledge, 2010.
- Pratt, Mary Louise. "Arts of the Contact Zone." *Profession*, 1991, pp. 33–40.
- Nussbaum, Martha C. *Political Emotions: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*. Harvard UP, 2013.
- Stalnaker, Aaron. *Overcoming Our Evil: Human Nature and Spiritual Exercises in Xunzi and Augustine*. Edited by James Keenan, Georgetown UP, 2006. *Moral Traditions* series.
- Moore, Thomas. "Neither Here nor There." *Parabola*, vol. 25, no. 1, 2000, p. 34.